



第十卷

文选_下

Selected Commentaries

关于钱端升

钱端升（1900-1990）上海人。早年就读清华大学，获得哈佛大学哲学博士。

从1924年归国到1952年，先后辗转任教于清华大学、北京大学、中央大学、西南联合大学等一流学府。著有《议会委员会》、《法国的政治组织》、《法国的政府》、《德国的政府》、《比较宪法》（合著）、《民国政制史》（合著）、《战后世界之改造》、《中国的政府与政治》等学术著作，另有学术论文若干。

除了躬耕讲坛，1949年之前，钱端升在民国言论界建树亦颇多。在执教之余，钱端升笔耕不辍，二十多年间辗转《北平晨报》、《东方杂志》、《现代评论》、《观察》等民国时期思想舆论界的主流报刊，尤其曾在1934年主持《益世报》社论主笔多半年，抗战期间与西南联大同仁主办《今日评论》杂志，发表了大量政论，对时代问题有切中肯綮的见识与建议，成为民国言论界的旗帜性作者之一。

1948年底，钱端升回到中国，投身于新中国的建设，被任命为北京大学法学院院长。1952年，奉命筹组北京政法学院并担任首任院长，曾参与我国1954年宪法的起草，活跃于中国外交领域、高教领域，以民主党派成员身份积极参政议政。1957年反右运动中，钱端升被打成“右派分子”，遭遇精神上的苦厄近二十年。1978年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彻底平反，如愿以偿加入中国共产党，在耄耋之年为中国政治学的重建发挥了余热。

主编简介

陈夏红，1981年生，甘肃岷县人，法学博士。
现为《中国政法大学学报》副编审。

早年从事法律人物相关研究，著有《百年中国法律人剪影》、《政法往事：你可能不知道的人与事》、《出没风波里：江平和他的时代》、《风骨：新旧时代的政法学人》等书。曾协助著名法学家江平教授完成其口述自传《沉浮与枯荣：八十自述》。编有《法意阑珊处：20世纪中国法律学人自述》、《辛亥革命实绩史料汇编》、《孙中山答记者问》、《孙中山演讲录》、《思想的气象：法大学术演讲录》、《思想的交锋：法大学术访谈录》等作品。近年主要从事破产法相关研究，在《法制日报》开有双周专栏“破产法札记”，在《法治周末》开有每周专栏“方寸正义”。

钱端升全集

第 一 卷 比较宪法

第 二 卷 法国的政府·法国的政治组织

第 三 卷 德国的政府

第 四 卷 中国的政府与政治（英文版）

第 五 卷 民国政制史（上）

第 六 卷 民国政制史（下）

第 七 卷 议会委员会（英文版）

第 八 卷 文选（上）

第 九 卷 文选（中）

第 十 卷 文选（下）

钱端升先生年谱长编（上）

钱端升先生年谱长编（下）





国家出版基金项目
NATIONAL PUBLICATION FOUNDATION

第十卷

钱端升全集

陈夏红 主编



Selected Commentaries

钱端升 著

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

2017 · 北京

声 明

1. 版权所有，侵权必究。
2. 如有缺页、倒装问题，由出版社负责退换。

图书在版编目（C I P）数据

钱端升全集. 1-12卷/陈夏红主编. —北京: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, 2017. 5
ISBN 978-7-5620-7422-9

I. ①钱… II. ①陈… III. ①钱端升 (1900-1990) —全集 IV. ①D-52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7)第068353号

出 版 者	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
地 址	北京市海淀区西土城路 25 号
邮寄地址	北京 100088 信箱 8034 分箱 邮编 100088
网 址	http://www.cuplpress.com (网络实名: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)
电 话	010-58908524 (编辑部) 58908334 (邮购部)
承 印	北京华联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	720mm × 960mm 1/16
印 张	375
字 数	5000 千字
版 次	2017 年 5 月第 1 版
印 次	2017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定 价	1800.00 元

目 录

· 下 册 ·

1941 - 1988

| 1941

民国三十年度的工作 / 3

日本的南进 / 7

论党务 / 12

新中国与一党制 / 17

三民主义的阐扬与宣传 / 22

三民主义与新世界的建设 / 27

| 附辑：《今日评论》时评

英政府一月十四日的对日照会 / 32

关税担保债赔各款的新处置 / 33

国联行政院会议 / 35

西班牙内战 / 37

美总统援助英法 / 39

汪精卫提和事件 / 41

罗斯福的和平运动 / 43

罗斯福和平建议的进展 / 45

云南龙主席斥“和” / 46

国联行政院会议 / 48

国府令缉汪兆铭 / 50

悼荷人蒲德利等 / 52

最近的国际情势 / 53

外汇比率又生变化 / 55

悼蔡子民先生 / 57

威尔斯访欧 / 59

希特勒与莫索里尼会谈 / 61

蒋兼主席劝蜀绅服务地方 / 63

今日的财政及经济 / 65

英阁改组 / 70

日胁越南 / 72

| 1942

War—Time Government in China / 74

论中国的战时政治体制 / 102

西南联合大学行政研究室丛刊序 / 121

| 1943

新世序与世界公务员 / 124

新世序的设计 / 129

新世序的建设 / 134

罗斯福四大自由之知与行 / 138

国际的经济分工合作为和平基础论 / 141

现代化 / 148

建国完成的期限 / 157

战后应否有一国际人权宣言 / 161

Wartime Local Government in China / 166

中国战时地方政府 / 191

战后世界之改造 / 207

| 1945

僵局如何打开

——论中国政治的前途 / 353

| 1947

今后世界民权建设之展望 / 360

教师与进步 / 364

世界大势与中国地位 / 369

唯和平可以统一论 / 377

| 1949

统一战线·人民政权·共同纲领 / 388

| 1951

反对美国订立亡国祸亚条约 / 397

北京市各学校普及和深入抗美援朝运动的报告

——在北京市教育工会、市学生抗美援朝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/ 404

努力改造思想，做一个新中国的人民教师！为改造自己更好地

服务祖国而学习 / 411

| 1952

我们一定可以打败美国强盗的细菌战 / 416

扑灭散布细菌的美国侵略者 坚决扑灭美国侵略者细菌战的毒焰 / 417

我贡献出一切力量以实现全国工学院调整方案 / 418

我们一定能够粉碎美国在远东的战争阴谋 / 419

共产党教育了我 / 421

How the People's Government Works / 424

人民政府如何运作 / 436

| 1954

用努力为人民服务的决心来迎接宪法草案的公布 / 445

对政法教育方针任务的一些体会 / 448

和高中毕业的同学谈谈学习政法 / 453

参加宪法草案（初稿）座谈会的体会 / 457

| 1955

亚非国家人民的正义事业必然胜利 / 462

| 1956

资产阶级宪法的反动本质 / 466

| 1957

批评“三害” / 496

我的罪行 / 501

| 1981

展望一九八一年国际形势 / 508

开展政治学研究的重要意义 / 510

| 1988

《钱端升学术论著自选集》自序 / 514

我的自述 / 516

1941 - 1988



1941



民国三十年度的工作

我们如完全摒除宣传式的夸大，以估计过去一年的抗战形势，则我们可说，在军事、政治及经济各方面，我们并没有特别的成就或是进步。只有在国际形势方面，我们曾有过意外的收获。

说在军事、政治及经济方面没有特别的成就或是进步，并不等于说在这几方面，一点没有成就或是进步。成就与进步当然是有的，在军事方面，胜仗有过不少。五月中随枣会战就是一很大的胜仗。敌人的兵力也消耗了不少。三十四万多人的死伤当然是一个巨数。但这些胜利或是进步，是对我有利的持久战中应有的现象。在政治及经济方面，新县制的推行、四川省政渐入常规、若干公路的完成或改良等等，也未始不是进步。但这些进步并不具有特别性，尚不能使一个较弱的交战国家突进为具有优势的交战国。

但在国际方面，则我们的地位，在过去一年中，有突的飞、猛的进。在去年九月底，德意日三国缔结同盟以前，我们虽百般求助于人，而人之助我，或则吝啬无比，或则代价甚高。在三国同盟以后，则英美二大国，不特开始予我以大量的助力，且能以益友视我，而不以倚赖者视我。当六七月间，法国方溃而英亦垂危之顷，国际形势本极不利于我。其危险的程度容为抗战以来所未曾有。稍一不慎，我国可以夷为德意的附庸，日本的鱼肉。然

而一转眼间，我国与英美隐隐成为三大洲的三大主角、三大同盟；国际地位既骤然高升万丈，而抗战实力的后盾亦骤然增加不知凡几。

当然，此种国际地位的提高是由抗战而来的。如果不抗战，英美必不能重视我，也不能以友相待。但我们也不可过分自信。如果日本不与轴心言盟，或是日本稍示英美以妥协，则我纵同样抗战，也未必就能得到英美的重视与友视。

因此，我们如以严于律己的态度，考量过去一年的抗战形势，我们并不能对于我们的工作成绩觉若何的特殊满意。如果不单看光明的方面，而同时也看到黑暗的方面，如果忆及敌方空袭所予我的损失，共产军所引起的纠纷，囤积居奇的风行，若干阶级的奢靡，则我们且须感觉极大的缺憾。我们必定要于今后一年中在各方面俱有较大的成就或是进步，然后最后的胜利可以不至长久的延缓下去，虽知其必属于我，而不知其何时才属于我。

我们过去的大毛病是各方面的工作，除了整军外，俱缺乏积极性，缺乏远见，缺乏大力，缺乏提纲挈领的优点。因为如此，我们的成就，纵使款项甚多，在大体上俱无多轻重。欲使民国三十年成为抗战过程中有意义的一年，我们务须做几件基本大事，至少是开始做几品基本大事。我因此谨建议三事请政府与人民共勉：第一，我们务须开始使政治制度化；第二，我们务须开始切实推行本于民生主义的经济政策；第三，我们须确立一个积极的世界政策。

先说政治的制度化，我们认为在目前及最近将来的中国，政治的制度化容或比召集国民大会或颁布宪法等一类大口号，更有急切的需要。我们在前年此时（本刊第一卷各期），尝多次论及制度化的重要。傅斯年王赣愚诸生的文章，虽隔二年，而时效不但未失，或且比昔日更显。国民参政会第三次会议时所通过关于制度化的提案，也依旧有他的价值。

所谓制度化，是说政治的推行要有一定的规范，一机关要有一机关的功能，一官职要有一官职的任务，如有一定的规范，则功可积聚而过可以知改；能人当权则事半功倍，庸人当局亦勉可按步就班。如无一定的规范，则

握大权者可以凭一己的好恶冲动以行事；效率有时固可宏大，但一有错误，便无从纠正。而且因为人的成分太大之故，下级官吏每不敢多负责任，无过成了上计，进取则为下策。此犹是指优良分子而言。下焉者则但知一味迎合心理，文过饰非，而不知有真是非。结果，政治的若干特别点纵可赖领袖者的精明而有超越的进步，但政治大体则常滞留于无计划无执行的状态中。

单就平价一事为例。国人对于平价的要求不可为不大，最高当局对于平价的淬励亦不可谓不至，但平价的成绩至今不过尔尔者，良因政治机构尚未臻健全，政治尚未能制度化，所以在上者虽计日程功，而在下者类多缺乏推动的实力。如果政治已经制度化，则平价的责任早当由各级政府负起，初无待负军国重任者的分心计划。

故政治不制度化，则不特国家社会未来的隐忧甚多，即新政的推动与政治的效率亦难望有可能。我们渴望政治即能开始制度化者，盖因惟如此新国家才能有一牢固的基础。

推行民生主义的经济政策的重要亦不在政治制度化之下。后者仿佛是方法，而前者则应是中国立国的目的。没有公平正大的目的固然不成，有了目的而无正当的方法，则目的也虽有而若无。

民生主义的经济政策的厘定当然不是一朝一夕之事，但我们此刻所急需者不是完整的经济政策，而是民生主义的经济政策的开始推行。三年余的抗战已引起了社会上莫大的变动。在此变动中，抗战有功者，其地位不一定有了增高，而地位增高或权利增加者则不一定于抗战有功。抗战本有对外对内两种作用。对外在排除民族自由平等的障碍，对内则应产生社会主义化的功效。必如此，然后社会安定，而人民能安乐。但三年来，社会经变动后，似乎离民生主义日远。发国难财者遍地皆是。此辈在社会上握有极大的经济实力，结果社会愈不平等，而有关抗建的许多大计亦随处遇到阻挠。如政府再不迅作有效的纠正，则甚为害自将更大。

然则政府应如何开始推行新的经济政策呢？我们以为政府应速采新的赋税政策。新的营业（指国营事业）政策，及新的薪给政策。如果新的政策含

有奖励或抑制某一阶级的作用，而同时执行者又得人，则短期内即可使社会趋近于民生主义的标的。必如此，然后后方的经济支持力可以增加，而战后的社会亦有安定可言。

政治制度化及采用新经济政策的目的是增加本国抗战的实力，采取积极的世界政策的目的则在增厚友邦的助力。我在本刊第四卷第二十二期曾建议一个世界政策。大意我主张民族自决；主张亚洲建立一区域组织，以中国及印度为领导民族；主张区域组织之上有一世界组织，以防止战争。我以为这应为我们的和平目的。我们的和平目的是如此，我们同时希望我们的与国——英美——能以我们的和平目的为他们的和平目的。只有如此，大战结束后和平会议度上，我们才有贯彻主张的可能。如果我们只顾目前的应付，而不问日后的大计，如果关于和平大计，我们仍消极的追随英美，则万一英美——尤其是英国——对于亚洲南部各小民族有不利于我的主张时，试问我们又将何以善其后？

我们要知道，我们虽然仍需要英美的助力，但英美之所以愿助我，乃因我已成为世界局势变迁中的一个重要因素。凡我们可以助英美之处，如遣兵南下助防等事，我们不可因顾惜实力而作壁上观。但我们应该主张之事，也不必因恐获罪英美而不改声张。我们必须勇敢，也必须率直，然后英美益能尊重我，重视我，而加密三国的联系益可加密，同时我们胜敌的机会也可增加。

我只贡述以上三点，而不及他事者，非敢说他事不重要，只因此三事具有基本性，行之可以使国兴，不行则进步无从快起。例如军事，军事当然极关重要，但军事方面的进步欲速不达。必政治有制度，经济能利国，外援有增加，然后军事方面的进步可长速。归根结底，总离不了本文所述的三点。因愿朝野能不以我言逆耳而忽之。

（《今日评论》1941年1月12日）



日本的南进

日本大陆政策的实现，其入手之点，总脱不了三个途径：一先取西伯利亚，消灭苏联在亚陆的势力，然后仿元蒙的故事，步步南进，以掩有亚洲的全部；二先平中国以增厚实力。然后南北并进，以完成其大陆政策；三为先收南洋各地，取消西洋各国在东方的根据地，然后伺机而动，或先攻功，或先吞灭中国，依次而完成一统亚陆的大业。日本自明治维新以至一九三七的七十年中，盖无日不在考量这三大计的得失之中，而第一与第二两途径之孰难孰易尤为争论的焦点。九一八与七七之间相隔达六年之久，其所以然，亦大半因先攻苏联后平中国，与先平中国后攻苏联之争，始终没有解决。如果中国实力的增加不如七七前三数年之速，日本或者还是不能有所抉择。中国进步之速，逼迫日本采取了第二途径，而有三年未决的中日大战。但自七七以至一九三九年八月的苏德协定，在这二年多中，日本并未完全忘情于第一途径。当攻华不胜之时，日本也常思及攻苏的途径。日苏关系之所以久呈紧张状态者，盖即在此。

三大途径中，南进的主张一向是潜伏而不显。盖南进需要海军。日本的海军对世界大势向来要比陆军及政客多些认识。南进政策的主要对象为英国。日本海军对英国又素具敬意。所以在理论上，南进纵是一个好途径，但在海军对英敬意没有消失的期间，南进的实行很少有人作准备；在其他途径没有绝望的期间，南进的必要更少有人坚持。